

【理论·探索】

## 微观视角下的图书馆职业洞察 ——读《图书馆情报学概论》兼与梁灿兴老师商榷

●周文杰 (西北师范大学 兰州 730070)

[摘要]通过对图书馆情报学基础理论建设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将洞察图书馆职业的视角归结为宏观和微观两个类型。文章在对于良芝教授出版于2016年的《图书馆情报学概论》一书的框架、特色等问题进行讨论的基础上,分析了这本从微观视角促进图书馆情报学内在融会的著作所产生的启示。参考文献9。

[关键词]图书馆情报学 宏观视角 微观视角 信息查询与获取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845(2018)06-0001-08

[引用本文格式]周文杰. 微观视角下的图书馆职业洞察——读《图书馆情报学概论》兼与梁灿兴老师商榷[J]. 高校图书馆工作, 2018(6): 1-8

自上世纪末以来,在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理论的“迷茫”与“无助感”挥之不去<sup>[1]</sup>,一批旨在梳理图书馆学科基本知识体系,以便使其廓清与其他学科边界的重要著述先后诞生。这些著述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批“专著式教材”。其中,吴慰慈等编著《图书馆学概论》(吴慰慈、邵巍编著于1985年,吴慰慈、董焱编著修订于2008年)、宓浩主编《图书馆学原理》(1988年出版)、徐引麓等编著《现代图书馆学理论》(1999年出版)、于良芝著《图书馆学概论》(2003年出版)、王子舟著《图书馆学基础》(2004年出版)堪称最近三十年来图书馆学基本理论建设的代表[迄今为止,图书馆学的边界与视域尚存在许多争论,本研究所述的“图书馆学”,大致类同于“图书馆情报学”、“图书馆资讯学”等内涵类似却名称各异领域的核心部分,对应于国外研究者所界定的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LIS)]。

2016年,有感于《图书馆学导论》(于良芝著,2003)“悖逆”了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整合的趋势,于良芝教授在对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所共同围绕的“信息的有效查询和获取”给予更充分关注的基础上,以重新考察数据、知识、信息、作品、文献等基本概念的定义为起点,通过将图书馆定义为一个“通过系统地收集和整理信息以保障其有效查询与获取的平台”<sup>[2]</sup>,从而建构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图书馆情报学”理论体系,《图书馆情报学概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由此诞生。着眼于当前图书馆职业内外环境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对《图书馆情报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的结构体系和理论

观点进行全面解读,或许不仅有助于从这本旨在消弭传统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之间的“离异”倾向的著作中汲取合理的理论养分,对澄清弥漫于图情领域的理论迷失或许也不无裨益。

### 1 图书馆情报学的两个观察视角

《概论》是一本以反思《图书馆学导论》为初衷的著作,这种反思植根于图书馆情报学理论发展的洪流之中。《概论》所构建的知识体系,既与本领域已有的研究一脉相承,也有其自身鲜明的特色。为完整地理解《概论》的主要理论观点,有必要先对图书馆情报学的理论发展源流进行梳理,以便置身于这一领域理论发展的全局,对《概论》所梳理的知识体系进行合理定位。

基于大量经过整序的记录资源,对个体用户提供以信息服务为主的各类服务,不失为图书馆职业得以自立的基石。面对图书馆职业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如果站在不同角度,常常能够对其做出不同的理论解释。概括起来,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是观察图书馆职业实践活动,从而展开图书馆情报学理论构建的两个主要视角。

所谓宏观视角,是以图书馆职业活动的社会作用和功能为认识起点,旨在回答“图书馆需要为社会解决什么问题”?社会机构(特别是财政支撑的公共机构)之所以存在,往往是因为其承担着解决某方面社会问题的公共职能。例如,学校为社会解决藉由教育而实现人类知识经验的传承问题,而医院则藉由医疗技术和手段为社会解决整体健康权利的保障问题。与此相类似,图书馆职业藉由大量经

过整序的记录资源以保障社会认识高级化为使命。从社会角度看,包括学校、医院、图书馆在内的各种机构都是为达成特定的社会目标而做出的制度安排。沿着宏观视角,迄今为止图书馆情报学领域的研究者大致已走过了一条历经三个阶段的理论建构之路。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主要依据来自图书馆情报学理论建构的对象、对职业活动的定位和所采用的核心概念。就图书馆情报学理论建构的对象而言,图书馆情报学理论发展经历了以“图书馆内部职业活动”为对象到以“图书馆相关职业活动”为对象再到以“作为制度安排的图书馆职业活动”为对象的三个阶段。以“图书馆内部职业活动”为理论建构对象时,图书借阅、整理等实际管理活动被作为图书馆情报学理论建构的主旨,由此而诞生了以“实体资源论”为特色的图书馆情报学理论体系。在这一阶段,图书馆职业的活动被定位于“资源(主要是图书)整序”,“图书(或文献)”是这一时期的核心概念,对各种图书馆内职业活动现象进行描述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上世纪中叶以后,多种形式的“交流论”逐渐兴起,图书馆情报学的理论建构遂进入了以“图书馆相关职业活动”为对象的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图书馆职业活动被定位于“知识、文献信息”等交流系统之路,处于一个将“知识”从“文献”中抽象出来的阶段。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学者谢拉(Jesse Sharan)提出了“社会认识论”,这是一个旨在对图书馆情报学的本质进行解析的理论框架。由于社会认识论以参照了个体的认识论为立论的起点,因此,当前图书馆情报学领域的研究者试图从“社会认识层次论”的角度,将图书馆界定为一种“保障社会认识高级化的制度安排”[关于社会认识高级化的主要理论观点,本文作者分别于2017年10月28日和2018年3月10日,在“2017年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湘潭大学)和“融合与创新:新技术环境下图书馆学知识体系重构暨南京大学首届青年图书馆学学者论坛”上进行了演讲,并同与会学者进行了讨论。关于社会认识高级化系统性论述的学术论文目前正在组织投稿],从而把图书馆职业活动定位于保障和促进“社会认识高级化”并把“社会认知结构”作为核心概念,力图构建一个完整而自洽的图书馆情报学理论体系<sup>[3]</sup>。迄今为止,关于社会认识层次论的理论建构正在进行,其解释力还需要接受图书馆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如上所述,沿着宏观视角,图书馆情报学的理论建构已有了极大的推进。大致而言,先后对图书馆

情报学产生影响的“要素说”、“规律说”、“矛盾说”、“知识交流说”、“社会认识论”等大致都可归为宏观视角。然而,图书馆职业实践表明,宏观视角并非图书馆情报学理论建构的唯一视角。与宏观视角相并行的,是图书馆职业实践活动观察的微观视角。

所谓微观视角,是以图书馆职业在微观个体层面所产生的潜在或实质影响为认识起点,旨在回答“图书馆能够满足个体用户什么样的需求”?与学校满足个体认知发展的需求,医院满足个人免受疾病困扰的需求相类似,如果图书馆这一机构是社会所必须的,则意味着其必须也为人们某种需求的满足做出贡献。于良芝教授提出,图书馆所满足的,便是个体信息查询与获取的需求,因此,个体信息查询和获取构成了图书馆情报学的基本问题(为节约篇幅,本文关于于良芝著《图书馆情报学概论》的引用仅首次标注于参考文献,其余引用均以句末标注页码的形式列出)图书馆职业是一种“满足信息查询与获取需要的社会分工”(P5)。由此可见,《概论》秉持了一个微观视角的立场。

由于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都以解释图书馆职业活动背后的理论质素为目标,因此二者具有很强的统一性。基于这种统一性,可将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整合为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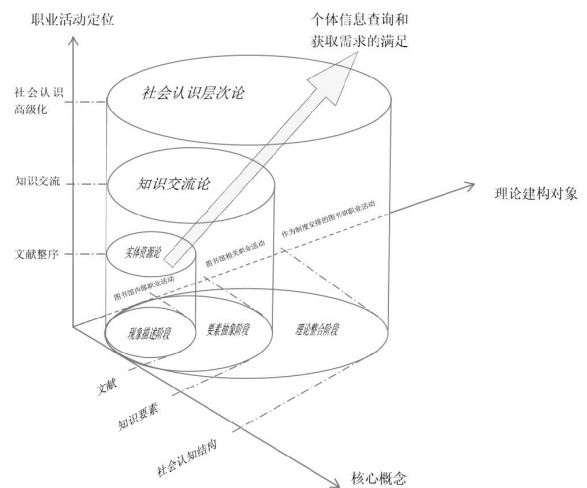


图1 图书馆情报学两个观察视角的整合

到目前为止,从宏观视角展开图书馆情报学的理论建构已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也已形成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代表性学者包括巴特勒、谢拉、卡尔施泰特等。我国学者宓浩、黄纯元等对图书馆本质的解析,也大致沿袭了宏观视角。与宏观视角被广为采用不同,图书馆情报学领域从微观视角展开理论建构的学者相对较少,且多被冠以“情报学”的名义。其中,德尔文关于“意义建构”的研究、查特曼关于

“小世界信息贫困理论”的研究、威尔逊关于情境化的个人需求的研究等,虽然并不一定直接着眼于图书馆情报学的理论建构,但仍可大致被视为从微观视角对图书馆职业活动(主要是信息服务活动)做出解释的代表。《概念》的立论基础,恰恰是微观视角,这使得《概论》与图书馆情报学领域现有的其他基础理论著述之间注定存在明显的不同。

## 2 《概论》的起点、框架与逻辑

《概论》之所以可被称为微观视角的图书馆职业观察,是因为这一著作以“人类的信息查询与获取需要”为立论的起点,并认为“如何随信息技术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持续保障信息的有效查询与获取”(P7),构成了图书馆情报学的基本问题。基于此,《概论》旨在从信息查询和信息获取这两个牵涉微观层面图书馆职业活动机理的因素入手,试图从哲学基础、理论和技术(方法)三个层次构建一个比较完整的图书馆情报学知识体系,由此而形成了如下框架。

### 2.1 图书馆情报学的哲学基础

《概论》充分重视哲学思想之于发展图书馆情报学理论的基础性作用。首先对比利时文献学家奥特勒的哲学思想带给图书馆情报学的洞见进行了介绍。简单来说,这一洞见主要指图书馆信息职业将可知但零散和凌乱的知识进行系统组织,从而使人的理性藉由一个协调的实在全貌而获得提升。此外,《概论》也对英国图书馆学家布莱克关于理念主义和功利主义两种思想共同影响了英国公共图书馆早期发展的相关研究工作进行了介绍。在对前人的研究带给图书馆情报学的哲学洞见予以介绍的基础上,《概论》对实在、真理、意义、信息的伦理问题等相关哲学命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和分析,并将图书馆情报学的理论构建置于这些一系列哲学概念所构成的基础之上。

将图书馆情报学知识体系的构建置于哲学基础之上,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概论》对其所构建的图书馆情报学知识体系的追求。正如奥特勒所说的,“一旦文献工作向全人类呈现了实在全貌,人们看待世界的高度将大大提升”(P84)。《概论》开宗明义,以对哲学基础的探讨作为对图书馆情报学理论体系构建的起始,所追求的,也是通过呈现实在的图书馆情报学的全貌,以提升这一学科的理论高度。

### 2.2 图书馆情报学相关的理论

《概论》将与信息查询与获取相关的理论大致归结为三个方面:信息相关规律、信息在社会中的分

布以及信息行为相关理论。

关于信息相关规律,《概论》主要介绍了洛特卡定律、齐普夫定律和布拉德福定律,此外也涉及了对普赖斯等人关于文献增长和老化规律的介绍。关于信息在社会结构中的分布,《概论》在对知识沟、数字鸿沟等现象给予关注的基础上,对信息政治经济学理论、社会排斥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及小世界贫困理论进行了介绍。关于信息行为相关理论,《概论》重点以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信息查询(searching)、搜寻(seeking)的情境(context)、情形(situation)等方面的研究为重点,对威尔逊、贝尔金、德尔文等人的理论进行了介绍,并把现有信息行为研究划分成了认知视角、行为视角、社会视角、觅食视角、整体视角。

### 2.3 图书馆情报学的技术

围绕着“人类信息的查询与获取”这个基本问题,《概论》分别从“信息查询技术与方法”和“信息获取技术与条件”两个方面,对图书馆情报学迄今所发展的用以支撑图书馆职业使命达成的方法进行了介绍。

《概论》认为,“信息查询过程确有自己独立的问题”,因此“需要图书馆情报学为其提供专门的理论与技术支撑”(P169)。这种支撑具体体现为信息检索过程的四个要素:信息系统、已知的信息集合、特定的信息需求以及信息与需求的匹配。《概论》不仅对图书馆内外的各种信息查询工具及其深化进行了系统梳理,还将信息组织放在信息系统这一“技术或物理环境(P178)”下,分别对基于“作品——载体”与基于“实体——属性——关系”两种概念模型的信息组织整理技术进行了系统解析和展望。

“保障信息有效查询和有效获取,构成了图书馆信息职业的两大使命”(P201)。信息获取过程同样需要一定的条件保障,由此为图书馆情报学留下了理论建构的空间。《概论》在对信息获取、信息可获得性和信息有效获取进行了界定的基础上,分别从基础设施、制度安排和平台建设三个方面,阐释了信息有效获取的保障机制,并对保障信息获取的职业伦理准则进行了讨论。

从起点到框架,《概论》为图书馆情报学的理论发展梳理了一条比较清晰的逻辑线索,即,“即使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信息查询与获取过程,已经要求技术(如检索设计技术)、方法(信息咨询访谈方法)、理论(信息行为理论、信息资源体系建设理论)、哲

学(伦理学)等智力支持。与信息有效查询及信息有效获取相关的方法、技术、理论、哲学思想,也因此构成图书馆情报学的知识体系”(P8)。

### 3 《概论》的主要特色

#### 3.1 独辟蹊径的微观视角

如前文所述,与大多数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著述不同,《概论》选择了一个观察图书馆职业活动的微观视角——用户的信息查询和获取。微观视角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更强调将图书馆情报学的理论大厦构筑在资源使用(如查询和获取)的基础之上。“藏”与“用”的矛盾是图书馆情报学领域一对固有的矛盾,“重藏轻用”的倾向使图书馆职业长期备受诟病。近年来,基于“藏”的视角展开图书馆情报学理论建构面临的挑战已日趋明显。主要体现在,依据传统印刷资源而发展的图书馆情报学相关理论面对数字化的时代,存在着各个层面的不适应性。显然,无论在采访、组织、保存、流通等哪个领域,传统资源与数字资源之间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别。既然立足于“藏”来梳理图书馆情报学知识体系面临挑战,则从“用”的角度展开理论建构不失为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选择。《概论》立足于用户信息需求满足这一微观视角,围绕“信息的查询与获取问题”对图书馆职业活动展开了理论解释,表现出比较鲜明的以“用”为导向的特色来。这种努力,不仅有益于本领域理论发展更贴近和适应于上世纪末以来图书馆情报学面临数字化资源改造的社会现实,也不能不说为图书馆情报学开辟一条有新意的理论建构之路提供了极大的理论启示。

#### 3.2 旗帜鲜明的整体性立场

跨越结构与主观能动性的二元对立,选择以整体性理论(integrative theory)立场来展开图书馆情报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不失为《概论》的一个重要特色。“结构与主体能动性的对立是社会科学理论中根深蒂固的理论断层之一,其存在不可避免地阻碍我们对活生生的现实的理解”<sup>[4]</sup>。因此,在对“人类的信息查询与获取”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时,《概论》也毋庸置疑地站在了整体性理论立场。具体体现是,在阐释具体的信息查询与获取方法与技术之前,将信息在社会结构中的分布(结构层面)与信息行为(个体层面)共同纳入了理论视野。

#### 3.3 揭示但不纠结于图书馆的本质

不断追问图书馆的本质,构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科研究的一大“风景”。从积极的方面看,这种追问促使本领域的研究者不断反

思,从而使理论建构的深度不断加强;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图书馆的本质是一个难以确证的抽象命题,因此空泛的讨论不仅可能加剧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之间分歧,也很可能会延缓图书馆学理论建设的步伐。《概论》以“人类的信息查询与获取”作为构建图书馆学知识体系的起点,不仅有效地避免了对尚无定论的“图书馆本质”问题的空洞讨论,而且通过用户这一微观视角,实质上对图书馆本质相关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示。

#### 3.4 承继并创新了一系列基础性概念

在数字化的时代,图书馆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需要对数据、信息、知识、作品、文献等基础性概念做出统一一致的界定。《概论》对于这些基础性概念的分析与界定,堪称典范。正是因为有了比较扎实的概念基础,《概论》在知识体系的安排和对一系列理论问题的解析中保持了逻辑上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从而赋予图书馆情报学理论体系随着资源形态的变迁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潜质。

#### 3.5 跨出但没有远离图书馆

挣扎于“馆内之学”与“馆外之学”之间,是传统图书馆学研究社区难以承受之痛。“馆内之学”的支持者认为,离开“图书馆”谈“图书馆学”是极其荒谬的;“馆外之学”的支持者则认为,图书馆学应该致力于探究抽象的、本质的要素,而不应当囿于图书馆这一实体机构。两种声音,至今争论不息。近年来,更有学者直指“图书馆”已成为图书馆学的“负资产”。现实中的怪象之一,是研究者在争取学术资源时,对图书馆学科趋之若鹜;在声明自己的研究发现时,却对图书馆学科弃如敝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种观点的争论,非但没有推动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反而极大地推动了本就薄弱的图书馆学与情报学走向“离异”。《概论》立足于用户(而不是机构或资源)导向,将图书馆定义为一个“平台”而不是“实体”,然后围绕信息查询与获取这一基本问题而展开了图书馆情报学知识体系的梳理。这个思路,跨出图书馆实体机构的边界,从而走出了“馆内之学”。同时,由于信息检索与获取始终是图书馆业务的核心,因此,《概论》所梳理的知识体系虽跳出但没有“离馆”太远,更没有抛弃图书馆这一机构。

### 4 《概论》未能回答的问题

作为一本专著式的教材,《概论》致力于克服20世纪7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的概论性教材很少反映信息行为研究、信息检索、信息素养、信息社会问

题等方面的成果,而针对情报学的概论教材则几乎完全忽视各类型图书馆在信息检索、获取和交流中的作用及其激发的理论与技术创新”(P1)等问题。沿着“人类信息查询和获取”这个思路,《概论》为融会的图书馆情报学构建了一个完整而连贯的知识体系。然而,《概论》所构建的图书馆情报学知识体系并非完美无缺。这些不足,有些源自于不同的观察视角之间难以兼顾而造成的缺憾,有些则源自于图情学科知识体系根深蒂固的认知“短板”。

在我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其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定位长期徘徊于技术与管理之间。由于用户和资源始终都是支撑图书馆职业和图书馆学科的两块基石,因此,观察图书馆情报学的任何问题,都需要兼顾二者。如果站在用户角度,图书馆情报学需要首先面对“如何保障资源能够被用户有效使用”的问题,为此,要解决“信息有效查询与获取”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厘清用户何以可能产生信息需求并通过何种方式满足其特定的信息需求,显然,这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问题;而站在资源角度,图书馆情报学则首先需要面对“如何对海量资源进行有效整序以备用户使用”的问题,为此,需优先关注何种组织方式的信息资源更易于被使用者所查询和获取,这是一个以“技术”为中心的问题。图书馆情报学的发展路径在管理与技术之间的纠结,正是源于这两个并存的“中心”。然而,图书馆情报学良性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清晰界定图书馆情报学到底应归属于管理学科还是技术学科。这意味着,任何一本图书馆情报学基础理论著述,都需要首先为自身理论建构选择优先采用的立场(管理优先或技术优先),然后才能展开系统的知识体系建构。从整书的布局看,《概论》选择的是管理优先的立场。

“人”是管理的第一要素,因此管理优先的立场要求理论建构从“人”的行为展开。但是,人的行为同时受到社会结构和主观能动性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早在2010年,于良芝教授就呼吁在信息社会问题的研究中,有必要跨越结构与主观能动性之间的理论分野,从而走向整体性(integrative)研究。围绕着“人”的信息活动,《概论》选择了一个整体性理论的视角,试图在解释信息查询与获取相关问题时,整合来自社会结构(如信息政策、信息使用差距等)和个体认知建构(如德尔文等的相关理论)两方面的因素的共同作用。然而,就目前图书馆情报学的理论发展而言,社会结构因素和主观能动因素之于信

息查询与获取的影响机制的理论解释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支撑信息资源的组织和整序及查询和获取的程度。例如,《概论》在介绍信息查询与获取的方法与工具之前,侧重介绍了萨沃雷宁(Reijo Savolainen)、威尔逊(T. D. Wilson)等关于信息行为的研究。然而,信息行为领域现有研究大都从外部因素(环境、情境)来考察人们的信息活动,而很少从与人的信息查询与获取行为密切相关的动机、认知结构等内部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入手展开深入解析,更几乎没有将用户的内在特征(如认知特征)与图书馆信息服务活动进行实质性关联。因此,在后续对信息查询和获取的方法和技术进行介绍时,《概论》又不得不重回图书馆学科的“传统”——从资源(而不是用户)角度来介绍信息的组织、整序及查询和获取问题。显然,离开用户谈资源(的组织与整序、查询与获取),不仅易于导致重藏轻用的倾向不断被复制,而且存在将图书馆情报学引向“技术决定论”的风险。这些问题,之所以无法在《概论》中得到回答,是由于图书馆情报学的知识体系在信息行为的理论研究与信息组织的实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这种状况,不仅反映了图书馆情报学知识体系中对“管理”这一核心质素研究不足的“短板”,也是“技术决定论”在图书馆情报学研究领域大行其道的理论渊藪。

在发展融会一致的图书馆情报学理论的过程中,需要警惕“技术决定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各种形式的“颠覆说”。从图书馆职业实践的角度看,如果站在用户的角度来观察信息查询与获取问题,这更接近于是一个涉及到对人、资源、时间、空间等管理要素进行协调的管理问题;但如果站在纯粹资源的角度来观察信息查询与获取问题,则在一定程度上会把这一问题引向信息(系统)设计、开发等工程问题的方向。考虑到自古至今图书馆(包括情报)职业在信息(系统)工程领域并无明显有别于其他职业的理论积淀、技术贡献与比较优势,因此,将图书馆情报学发展的内生动力归结于管理(而不是技术)似乎更加令人信服。当然,跟其他相关职业类似,图书馆(情报)职业活动不可避免地需要大量借助甚至依赖于技术工具。因此,掌握技术的应用(而不是开发)对于本领域的从业者来说,非但必要,而且必须。按照这个逻辑,图书馆情报学支撑下的图情专业应当培养的是“懂(信息)技术的(信息资源)管理人才”而不是单纯的“(信息)技术(开发)人才”或“懂(信息资源)管理的(信息)技术(开

发)人才”。为此,在“信息查询与获取”问题上,如何协调用户与资源两个向度,以便让图情专业所培养的“管理人才”能够实现“懂技术”的目标,仍是一个《概论》没有做出回答的问题。

## 5 《概论》带来的几点启示

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宏大的变革。这场变革在图书馆相关职业领域的体现就是数字资源的异军突起。面对新的时代,传统的图书馆学需要从情报学中汲取“情报”的营养,而情报学需要借助于传统的图书馆学所搭建的体系与平台。从这个意义是说,图书馆学与情报学走向整合,是这“两个”学科面对数字化挑战而内在地产生的一种需要。《概论》从“人类信息查询与获取”这一微观视角入手,为“两个”学科之间内在地融为一体提供了诸多启示。图书馆情报学领域,诸多研究者也面对图书馆职业“颠覆说”甚嚣尘上,图书馆学科的亲邻学科走向“重新定位”的现实<sup>[5]</sup>,就图书馆情报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梁灿兴老师发表于《高校图书馆工作》2018年第2期的论文《哲学史和科学史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一些启示》(以下称“梁文”),富有思想性和批判性,读之令人获益良多。但文中一些观点,也尚有结合《概论》加以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 5.1 哲学基础之于图书馆情报学理论发展的必要性

《概论》将图书馆情报学的基本问题和知识体系分解为三个层次:哲学基础、理论和技术。对于图书馆情报学知识框架的系统梳理,《概论》也是从“信息与实在、真理及道德”等哲学命题开始。梁文中,作者指出,“由于政治对学术的强力介入,使用哲学方法研究图书馆学的风气遂随之兴起,至今不息”<sup>[6]</sup>。事实上,在图书馆情报学理论之所以需要构建在一个相对坚实的哲学基础之上,更多体现为一种内生的动力,而不是外在的干预。例如,谢拉所创立的“社会认识论”哲学色彩明显,但似乎看不出创立者受到明显政治干预迹象。据此可见,自觉地接受某种哲学观念的指导,是图书馆职业实践理论化、系统化的基本条件,也恰恰是图书馆情报学理论发展的前提。正如梁文所提到的,“哲学是一种对生活常识的整体性解释,这是所有文明的思想都具有的特征”。对司空见惯的信息查询与获取现象做出一个整体性解释,正是《概论》所阐发的图书馆情报学知识体系的核心。这种解释,源自于理论构建的内在需求,而不是外在的政治或其他因素。从这

个意义上看,图书馆情报学的理论发展之所以需要哲学,并不是要把哲学概念直接用于图书馆学研究,而是要把图书馆学的理论质素抽象到哲学层面。唯有在哲学层面实现对图书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解释,才能获得一致的、连贯的理论创见,也才能使图书馆情报学赢得与其他学科比肩学术之林的机会与资格。

### 5.2 “理论联系实际”之于图书馆情报学研究的重要性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困扰图书馆情报学领域研究者的一个重要问题。巴特勒在其出版于1943年的《图书馆学的参考职能》一书中谈到,“一些图书馆员不喜欢也不相信理论,他们只知道社会需要有效的图书馆服务,而不清楚社会也需要理论观点。他们担心对专业理论的探索会导致对实际工作的忽视。另外一些图书馆员则认为,图书馆的全部工作,应接受理论分析的指导。这种分析将揭示基本规律和原则。他们相信一套完美的图书馆理论是可以在不损害实际工作效率的情况下向前发展的,甚至还相信,必须在建立了这套完美的理论之后,图书馆员才能在他们的实际活动范围内胜任他们的工作”<sup>[7]</sup>。

大致而言,图书馆情报学可被称为一门实践导向的学科,实践导向的学科如何进行基本理论的建设是图书馆情报学理论建构中必须直面的一个基本问题。早在三十年前,我国图书馆情报学家宓浩就对“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作了区分,并指出,理论图书馆学所包含的内容在整个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中,是连续其它部分的基础和纽带。它的任务是抽象图书馆学的一般性原理和规律,揭示图书馆学的本质特性,系统地再现图书馆学的发展历史,科学地预测今后的变化,从而保证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实践活动能最优化地发展<sup>[8]</sup>。图书馆学基础研究(理论图书馆学)在于阐明图书馆学的一般原理,它的研究内容应从客观层次上组织<sup>[8]232</sup>。图书馆学应用研究(应用图书馆学),重点在于研究文献收集、组织、整理、贮存、传递、利用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技术<sup>[8]233</sup>。应用图书馆学的研究是整个图书馆学体系的主干。应用图书馆学要把理论图书馆学的一般原理广泛运用于图书馆工作实践的各个领域,并接受理论图书馆学的指导<sup>[8]234</sup>。应用研究是基础理论发展的基础,应用研究检验着基础研究的成果<sup>[8]234</sup>。

梁文指出“‘理论联系实际对科学研究并不构

成必然的要求”<sup>[6]</sup>,并以数学等学科为证据对此进行了论述。需要注意的是,数学、逻辑等工具性学科的理论发展或许不需要联系实际,是因为这些学科生长在一个自适应的系统中。工具性学科的存在价值,是为其他科学领域的理论发展提供系统一致的分析工具。如果把图书馆情报学归属于实践导向的应用学科之中,显然,理论不必联系实际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对于应用性学科而言,如果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的情形,是极其危险的。罔顾实践而谈理论,无疑会走向坐而论道,成为“玄学”;抛弃理论而谈实践,无疑会走向工具主义,沦为“指南”。

另外,梁文中,作者也指出,“不能理解新技术就无法进行基础理论研究”<sup>[6]</sup>。这就涉及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图书馆情报学基础理论是否需要相对超然于技术?回顾形形色色的“颠覆”说就可以看出,如果把图书馆情报学的理论发展“绑定”到技术更新的战车上,不但会陷图书馆情报学于(因技术更新而导致的)被永续“颠覆”的尴尬之中,也极可能使图书馆情报学理论发展丧失逻辑上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从这个角度看,好的图书馆情报学理论应当能够分析或预测图书馆职业活动需要什么样的新技术,而不宜将理解新技术作为基础理论研究的前提。理解新技术,对于图书馆学人来说确实非常重要,但却不足以构成基础研究得以开展的前提。

毋庸置疑,图书馆情报学领域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普遍存在。宓浩曾指出,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存在两种争论:一是从图书馆实体出发确定图书馆学对象,其弱点在于无法在理论上达到高度的抽象,也概括不了所要研究的客体的本质属性。二是用抽象认识去反映图书馆实体活动,并联系社会环境进行考察(P231)。最近数年来,图书馆情报学领域理论构建与职业实践之间的断裂已经成为一个触目惊心的严重问题。一个极端的表现是,部分图书馆在招聘中喊出“除图书馆学专业之外,其他专业的学生都需要”的口号。显然,如果图书馆情报学割裂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则既无法得到研究者的跟进,也无法得到实践者的响应。《概论》从“人类信息查询与获取”的角度展开图书馆情报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既防止了从图书馆实体出发确定图书馆学对象的倾向,又避免了从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如“规律”或“要素”)出发去构建基础理论。因此,《概论》所选择的微观视角,为图书

馆情报学的理论建构留下了空间,也紧贴着图书馆相关职业活动的实际。从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角度看,《概论》无疑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

## 6 远非结束的结语

本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对研究发现进行报告而形成的学术论文,而是一篇为消除理论的“迷茫”与“无助感”,重读《图书馆情报学概论》而写就的“读书笔记”。站在“人类信息查询与获取”的角度,重新思考新时期图书馆情报学与图书馆职业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特别是在与图书馆学科具有密切亲缘关系的情报学科发展目标需要“重新定位”、情报工作的性质和作用需要“重新认识”、情报学课程需要“重新设计”渐成共识<sup>[6]</sup>,图书馆职业面临“颠覆”的背景下<sup>[9]</sup>,澄清一些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或许不仅可为当代图书馆学人走向坚守提供理论定力,更有可能催进图书馆情报学研究者不断加快基础理论建设的步伐。由是观之,即便本文仅仅是一篇读书笔记,仍然有被寄予期望的必要——设若这篇读书笔记竟能为图书馆情报学领域的研究者所重视、评点甚至提供启示,则幸莫大焉。

## 参 考 文 献

- [1] 黄纯元. 知识交流与交流的科学[M]//追问图书馆的本质.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187-203.
- [2] 于良芝. 图书馆情报学概论[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
- [3] 周文杰. 二维向度中的图书馆学科理论视域与边界:一个基于职业实践的元理论分析框架[J]. 图书馆,2017(12):1-6.
- [4] 于良芝,刘亚. 结构与主体能动性:信息不平等研究的理论分野及整体性研究的必要[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1):4-19.
- [5]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 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南京共识[J]. 情报学报,2017(11):1209-1210.
- [6] 梁灿兴. 哲学史和科学史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一些启示[J]. 高校图书馆工作,2018(1):3-7.
- [7] 袁咏秋,李家乔. 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 [8] 宓浩主编,宓浩,刘迅,黄纯元编著. 图书馆学原理[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 [9] 张晓林. 颠覆性变革与后图书馆时代——推动知识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8(1):1-12.

[作者简介]周文杰,教授,现在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工作。

[收稿日期]2018-06-29

(刘平 编发)

## Exploring the Librarianship under a Micro – level Scope: Review on Introduc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Discussing with Mr. Liang

Zhou Wenji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basic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work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at the two perspective types of exploring librarianship can be called macro and micro scopes.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n the framework and characteristic of *Introduc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this paper revealed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masterpieces that promoted the integr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rom a micro – level scope. 9 refs.

**Keyword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Macro – scope. Micro – scope.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acquire.

【信息·动态】

### 全国首届“图书馆杯主题海报创意设计大赛”总评在东莞举行

2018年10月20日,全国首届“图书馆杯主题海报创意设计大赛”现场总评在东莞图书馆举行,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原副校长张凤昌、澳门大学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广州美术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院长、广州国家广告产业园负责人曹雪、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东莞图书馆馆长李东来等十位专家担任评委,经过评委们数轮投票及讨论评议,最后由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选送的作品《新时代·新阅读·新未来》和浙江农林大学图书馆选送的作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获评大赛特等奖,另评选出一等奖20名,二等奖30名,三等奖50名,优秀奖200名。

大赛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办,大学生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图书馆与社会阅读专业委员会、图书馆展览与文创专业委员会联合承办,广东粤图之星科技有限公司协办,全国各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参与组织,以“新时代·新阅读·新未来”为主题面向全国读者征集阅读推广创意海报。大赛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联动宣传、协同推进,使用在线平台进行公开征稿,读者通过比赛官网进行报名、上传作品,图书馆通过比赛网络平台完成推选、网络初评等工作。大赛于2018年6月1日至9月20日征集期间,在全国各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的大力推进下,吸引了众多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参与,大赛覆盖全国32个省级行政区,共计1168个图书馆报名作为组织单位参与大赛,共有17796名读者报名,通过审核作品13925件。

大赛评选出的优秀作品拟在全国各图书馆巡展,并应用于图书馆阅读推广宣传,以及与阅读推广相关的文创用品开发。大赛积极响应国家支持和发展文化创意与设计服务的相关政策,鼓励优秀设计人才参与阅读推广宣传工作,加强了图书馆与读者的互动,让更多读者参与阅读推广和体会阅读之美,在推动书香中国的建设以及助力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秘书处)